

汪观清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撰稿

汪观清 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汪观清 口述历史

汪观清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撰稿

口述历史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汪观清口述历史 / 汪观清口述 ; 邢建榕 , 魏松岩撰稿 . —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16.1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187-2
I. ① 汪… II. ① 汪… ② 邢… ③ 魏… III. ① 汪观清
— 回忆录 IV. ① 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709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鄢书径

汪观清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汪观清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65 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20 000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87-2/K.205
定 价 55.00 元



汪
觀
清

汪观清，当代著名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安徽黄山书画院名誉院长，上海市民盟书画院院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从事连环画创作三十余载，作品《红日》(四集)获第二届全国连环画评比二等奖，并以《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成为知名军旅题材连环画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潜心国画，善画牛，亦攻山水、人物，作品六十米风情长卷《梦里徽州》广受赞誉，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足迹馆展出。

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径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目 录

编撰说明……	1
一、慈母与游子 ……	1
二、洋学堂的老师 ……	11
三、我的第一本连环画 ……	19
四、从“新美术”到“人美” ……	28
五、人美社一百零八将 ……	37
六、住进了花园洋房 ……	51
七、“黄金时期” ……	57
八、“七叶社”风波 ……	65
九、下乡 ……	73
十、《红日》(上)……	82
十一、《红日》(下)……	89
十二、画雷锋,学雷锋 ……	98
十三、二画好八连 ……	106

十四、从四清到“文革”	114
十五、儿子的境遇	120
十六、在干校画牛	126
十七、开辟枫泾“根据地”	133
十八、“金山农民画”炼成记	139
十九、练江牧场	146
二十、万水千山	155
二十一、连环画风光不再	162
二十二、黄山上的警察画家	170
二十三、饮水思源报乡梓	175
二十四、成立新安画派研究院	181
二十五、笔墨纸砚(上)	189
二十六、笔墨纸砚(下)	196
二十七、海外行	204
二十八、在美国的故事	212
二十九、移民加拿大	222
三十、百牛贺回归	230
三十一、加入文史馆	243
三十二、梦里徽州	248
附录 汪观清年表	258
后记	266

一、慈母与游子

有一个哲学问题，我从哪里来？好吧，我就借用一下，以此开始我的自述。

我的祖籍是徽州，在安徽的新安江以南。历史上的徽州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新安画派、徽派建筑、徽商徽菜等等，都被称为徽文化，而且随着徽州商人的脚步，影响遍及海内外。这里人才辈出，古有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近有一代宗师胡适，人民教育家、倡导生活教育理论的陶行知。光是清朝，状元就出过十多位。

徽州山清水秀的自然条件和贾而好儒的人文环境，为一个画家的成长，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可以说，徽州是我的根，也是我倾注无限情感、终身留恋、引以为傲的地方。1931年，民国二十年，农历辛未羊年，我出生在那里。祖父为我取名汪仲良。

年轻的读者可能觉得那是一个岁月久远的年代，如同电影里的画面，遥远而陈旧。然而，对我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我出生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共和体制，但仍是军阀混战，武夫治国，1931年还发生了混乱的中原大战；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年，绵延中华大地两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但浓厚的封建思想和封建习俗还残留在人们的生活里；五四运动已经逐渐由一场游行，演化成一种思想形态，蔓延开来，它的触角正渐渐渗入到每一个角落。具体到我所生活的歙县金滩村，那是典型的中国江南的一个乡村，其情形和鲁迅先生在《故乡》中的描写非常接近。

我初生时，家里是祖父治家，就从我的祖父谈起。

徽州男人世代重复着一种固化的人生模式：成家立室—外出谋生—

晚年返乡。我的祖父也不例外，但他的外出谋生，相较别人，多了一份传奇色彩，应了世人常说的那句“善有善报”的老话。

早几年，我发动乡民写村史时，听村里上年纪的老人说，祖父年少时，生活困苦，十二三岁给人当长工以谋生。

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贪睡赖床的年龄，可是祖父每天必须天不亮就起床，乘着朦胧的晨色，抑或是稀朗的星光出门，拾捡狗屎，作为主人家土地的肥料。除了起床要早，每天还要走上十几里的山路，放牛、砍柴，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劳动。日子单调而清苦，但祖父是勤劳和乐观的。

西方有句格言，大致的意思是说，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勤奋的人。一天，祖父照例重复每天的活计，他在路上捡拾狗屎牛粪。经过路边的一个亭子时，祖父意外地瞥见路亭的石凳子上有一个包裹。一望便知，应是旅途中在此歇息的人不慎遗落的。天光刚刚启亮，祖父看看天色，想，落下包裹的人应该也是天亮赶路，不会走太远。于是，祖父拾起包裹，沿着乡路快步追赶，逐渐赶上一个渐渐清晰的背影。一问，正是包裹的主人。对方感动之余，当即拿钱酬谢祖父，再三请祖父收下，祖父自然拒绝了。双方告别时，那人给祖父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明联系方法、详细地址，及交通方式。并告诉祖父说，哪一天你想从徽州出来谋生，可以写信给我，会有人安排你怎么走，并给你路费。

如果没有后来祖父离开徽州，这不过是他人生旅程中一件可以被忽略的小事。这件事之后，祖父继续如常地生活。不久，按照徽州的传统，祖父到了外出谋生的年龄。他想起那张名片，尝试着按照上面的地址发出一封信。果然就得到了回讯、路费，以及如何去江苏启东的水、陆交通的指路条子。祖父梳好辫子，背上包袱，在家门口搭上去杭州的木船。雾霭中，我的祖父悄然立船头，远离家乡，去了江苏启东青龙港。

在我的家族中，祖父的故事每个人都知道，我也常给我的孩子及认识的人讲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相信任何人都希望和有德者共事。诚实为人、信守承诺，成为我一直恪守的行为准则，也是我对周围人的诚恳

建议。

祖父到启东后，在杂货铺里做伙计。年后，返乡，结婚，成家。之后有了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几年后，祖父的第一位妻子过世。再之后，祖父和本村滩头的方氏寡妇，即我的祖母结婚。结婚时，祖母带来了三个江姓女儿。

我的祖父勤勉而恪守本分，同时也有徽州人与生俱来的敏锐商业意识。几年以后，他开始尝试做一些生意。新安江流域盛产茶叶，渐渐地，祖父将家乡的茶叶等特产，带到启东销售，生意越做越大。及至后来，自己立业，创立茶行，取商号“恒源祥”。生意有了规模之后，祖父的两个女婿和两个孙子（大货、小货）也跟随过去，帮助打理生意，并在当地生根、开枝散叶。我三姑父和大伯父的后代至今还生活在启东。

祖父在启东做生意期间，祖母像所有的徽州女人一样，在家侍奉长辈，料理家务，照顾子女。祖父也像所有的徽州男人一样，将生意上赚来的钱寄回家，买田置地，盖起了大房子，一家人逐渐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

这期间祖父和祖母有了五个孩子，二子三女。我父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祖父在九十五岁过世，一个月后，小他十岁的祖母也离世了。祖母死于脑溢血，在所有的子孙里，她最疼爱我。弥留中，祖母一直坚持等到我回去。看到我，笑了，随即驾鹤西去。

我祖父的堂屋命名为“耕莘堂”，有一块木匾悬挂在中堂厅上，是“农耕莘莘学子”的意思。这也是我后来取名号“耕莘堂主”的缘由。

尊奉徽州传统，我父亲在十六岁时娶我母亲为妻。母亲比父亲大三岁，我婶婶比叔父也大四岁，这样的结合在徽州很常见。在以农耕为主的徽州乡下，组建家庭时，夫妇的年龄一般都很小，如果女方的年龄稍长些，就能更早地承担更多的家务。

我母亲是缠过足的小脚女人，认识几个字，娘家在我们村的河对岸，以方姓为主的渝滩村。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家族经济状况在祖父的经营下，

已经相对殷实。父亲这一辈不再需要像祖父当年那样，因为生存的压力而盲目地出去讨生活了。婚后不久，父亲和叔父一同到上海当了学徒。我童年的时候，记得家里所有的家务都是母亲在操持，父亲偶尔回乡，从上海带回些新鲜玩意儿。

我的母亲有着一切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她坚韧、勤劳、善良、宽厚。母亲每天在晨曦微露时起床，开始劳作的一天。她为全家人准备早饭，侍奉公婆起床，喂鸡喂猪，照料田园，然后带着当午餐的玉米馃子，扛着农具，步行上山，去料理山上的几亩山田。有时逢上农忙，她踩着小脚，每天十里山路，往返于家与田地之间，一忙就是整整一天。天黑了，地里看不见东西了，才肩背一捆柴草下山回家，真正的两头见星星。而家里，还有一堆的家务在等着她。当年，母亲是家里十个人中唯一的壮年劳动力。

对于一个徽州女人来说，似乎生来就要操持家务，辛勤劳作。当辛苦成为常态，在岁月的流逝中，体力的付出就逐渐成为一种适应和习惯。但是，我的母亲却在内心承受了比常人更多的仁忍和辛酸，那就是与子女的生离和死别。

我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几年后，陆续又有了弟弟和两个妹妹。

姐姐秀莲生下不久，我母亲生病。祖父就请人来占卜，占卜的人说，姐姐属牛，母亲属牛，母女属相相克。祖父本就重男轻女，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姐姐幼年就被送给同村的族人家，做了养女。姐姐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被送走后，母亲再也不能对女儿悉心疼爱、嘘寒问暖。这种骨肉的生生分离，让我的母亲万分痛苦。

姐姐的养父母一直务农，家境不如我家，她在生活上就难免受苦。母亲惦记女儿，但也只能在路边遇到的时候，多几声询问和叮咛。回家后，心疼，只会默默垂泪。我们几个兄妹后来都读了书，在各自的领域有了不同的成就，只姐姐因被送人而无法接受教育，和我们的人生境遇产生了巨大落差。每念及此，母亲总有深深的同情和遗憾。

更为不幸的是，我的哥哥，家中的长子，十岁那年得了病，在多方医治无效后过世；第二年，弟弟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离世。母亲为此悲痛难抑，痛不欲生，在地上打滚哭唤。当时父亲远在上海，虽然也悲痛，却无法花很多时间来陪伴母亲，给予安慰。对于我的母亲来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绝望的时光。

母亲独自面对这些苦楚，一直很少向人倾诉，但我有时会试着去体会和理解她的心境。母亲后来对我说起过弟弟过世的经过。她说，家人见弟弟下午玩耍后睡在床上，初时，以为是玩累了，在休息，不以为意。晚饭时久叫不醒，用手触摸，才发现已经没了呼吸。现在想来，应该是得了脑膜炎之类的急症。

因为有这部自述，我想提一下我哥哥和弟弟的名字，算是对离去几十年的手足的怀悼。我哥哥的名字是汪仲书，弟弟汪仲富。

我母亲一生的一部分时间是用来思念儿女的。她会充满愧疚和怜惜地谈起姐姐，无限思念地忆起哥哥和弟弟。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几十年来，我每次回乡，总是乘船到河对岸去探望姐姐，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今，我们都已到耄耋之年，愈发姐弟情深。2014年清明，我回乡，适逢姐姐九十岁寿诞。我请来近亲五十多人同贺，并特意作《牛羊松图》，题款“仁义值千金，击角歌有情”送给姐姐。姐姐属牛，我属羊，松树寓意我们身体的健朗和精神的蓬勃。

哥哥和弟弟离世后，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丁。家人生怕再出事，都特别疼爱我，祖父再次请人卜卦。占卜的人说，要将我过继给山上庙宇里的观世音菩萨才能活命。为保住汪氏这一支唯一的血脉，家里人丝毫不敢怠慢，带我到了村后山的杨梅坎寺院。

寺院里仅有一个和尚，德宝师傅，村民们都叫他“德宝师”。行过拜师礼后，师傅给我穿上小和尚衣服、披上香袋，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改了名字。师傅说，就叫观清吧。于是，我从汪仲良正式更名为汪观清，那一年我七岁。

成年后，我离开了家乡，在上海有了自己的事业，但每次回去，都会上山去探望德宝师傅。五十年代，政府动员僧人还俗。德宝师傅就地还了俗，就在庙里结婚，成家，转变为一个地道的农民。

我三十岁那年，回乡探望父母，德宝师傅闻讯，也赶到我家。师傅来得匆忙，进门后，既不落座，也不饮茶。只是反复催促，叫我快给他画一幅像。我请师傅坐在竹椅上，自己坐在门前的石阶上，在他的一再催促声中，我用十分钟时间完成了一张他的速写画像。师傅急切而又喜悦地拿着画像催我快签上名字，然后风一般，笑吟吟地快步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渐渐有了成就之后，在家乡也算名人了。德宝师傅下山，到村里小卖部买东西。听人说，我的画难求，他就和人打赌，说可以立即轻易拿到，赌资是三两酒。那天，得到画像后，师傅一边将我画的画像示人，一边骄傲地向众人解说：“你们不知道，我是他师傅，他的名字都是我给取的呢！”这正是师傅乐观、谐趣的地方。

德宝师傅八十多岁过世，生前有爱吸旱烟的习惯。一杆九寸十三节虎头蛇尾的三色铜镶竹烟筒伴随他多年，从不离身。材料是师傅自己到竹林中选来的，烟筒取自细竹，必须趁着新竹笋的时候精心加工裁制。这支烟筒因使用的年头久了，已经呈现出厚重的紫红色，是他的心爱之物。师傅过世之前，特意将烟筒托人转赠予我，以做留念。这支沉淀着德宝师傅情谊的烟筒，我珍藏至今。

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别人的生命里留下痕迹，德宝师傅给予我的最大的印记，是我的名字。

我与母亲的感情是一种深深交融的亲情。母亲第一次来上海，是在我的哥哥弟弟去世，我成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后。因为异常宝贝，母亲决定把我送到父亲身边，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她带着我和两个妹妹离开徽州，去往上海。

那一次，我们从金滩村前的新安江乘船，顺流而下，行了七天，先到达

杭州，再从杭州转乘，坐火车来到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家乡。伴随着蒸汽的汽笛，飞驰的火车，沿途的景观，都让我觉得新奇、兴奋。母亲在上海呆了两个月，带着小妹妹秀云返回徽州，留我和大妹妹秀英与父亲在上海一起生活。

此后，母亲一直生活在徽州。很多年，为了看望她、照顾她，我便不停地往返于上海和徽州之间。特别是母亲晚年，身患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经常突发心绞痛。那时，只要家乡一有电话打来，一听到母亲身体不适的消息，无论我在做什么，都会立即向单位请假，回去陪伴。当然，顺便带上创作任务。

五十年代，从上海到徽州，虽然已经不像第一次和母亲出行那样，要水路交替，舟车劳顿，但仍需要坐十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后来路修好了，减少了些颠簸。当时，也有安徽练江牧场的车，往返于上海和歙县之间运送奶制品，我便常搭乘牧场的运输车，或者随车托送些东西给母亲。再后来，“文革”之后，我所工作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不再要求创作人员坐班，我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乡下照顾母亲。

我总是竭尽所能给母亲最好的药品和照顾，我稿酬的一部分都用在了母亲身上。早年生活条件受限的时候，我曾经为了给母亲治病，卖掉过自己心爱的一块金表。对母亲的关心和照顾既是我们的母子情深，也是徽州文化中传统孝道在我身上的体现。

1988年，母亲病危，我赶回去照顾，母亲很快就好起来了。村里人都说我母亲命好，说她每次生病，生的是想儿子的病，儿子一回来，病就好了。但是母亲的身体仍然虚弱，我每天陪伴着她，她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晒太阳，我坐在边上和她说话。午后的风静静地从堂前穿过，乡间的燕子在檐下进进出出。那一年，正赶上我在日本要开画展，再过三天，画展就要开幕了，我人还在徽州。为了不耽搁远在国外的画展，我尽量温和地、缓慢地对母亲说，县里的领导让我去画幅画，就去几天，很快就回来，有事可以叫人到县里找我。母亲答允后，我立即回到上海，奔赴机场，赶去日本。出发

前，考虑到母亲病愈不久，为免她挂念，我事先安排，特意买了许多食用的东西，请村里邻居每隔三四天，带着东西去看望她，就说是儿子捎来的。

日本画展甫一结束，我即刻回到上海，第一时间转道回到母亲身边。见面后，母亲疑惑地问：“不是说就去几天吗？怎么去了十一天，这么久啊！你是不是回上海了？”我又温和地、缓慢地向她解释：“我去日本了，因为有一个画展在那里，画展一结束，马上回来陪你了。”母亲听后，很是心疼，说：“你去那么远，不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赶回，太辛苦！”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和照顾母亲，我有时会在家乡完成部分创作。我住在祖屋的楼上，偶尔晚上工作到十一二点钟。万籁俱寂中，总能听到楼梯上响起细碎的脚步声，我的患有眼疾的母亲手扶楼梯，借着微弱的灯光沿阶而上。或为我送来烤火的竹火笼，或是一碗覆着毛巾的红枣莲子汤。她并不打扰我的工作，总是轻声开门，把东西放下，在我的搀扶下悄然下楼，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

母亲一生热爱劳动，也习惯了劳动。只要身体稍好就去劳动，有时身体不好也去，她去挖河滩边的沙地，出一身汗，病就好些。母亲那时已经患了青光眼，视力很不好，严重时看不清人。一次，没有事前通知母亲，我从上海回去。找她，见她在河边沙地劳动，我示意边上的村人不要作声，我也不说话，接过她手里的锄头，在边上帮忙干活。她感觉身边有人，却不知道是谁，就说：“你这个哑巴，人真好，经常来帮我做事。”逗得村人忍俊不禁。

母亲为人节俭，总是省吃俭用，对他人却很豁达大方。遇有困难的乡邻借钱，她总是有求必应，每次亲戚朋友人情往来，母亲也总是在用度和馈赠上毫不吝惜。母亲的这种可贵的品德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在乡下陪伴她的时候，偶尔会找些借口，或生日，或节日，往县里打一个电话，出钱包场电影来村播放，或请剧团来演戏，乡民们看得都很开心。每次演出的背后布景都由我来手绘，有人开玩笑说，这是最昂贵奢华的布景。

1985年，牛年。我的画展要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这之前，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在县医院开刀做了手术。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我一直在照顾术后的父亲。画展开幕的前三天，父亲办理了出院手续。按照我的想法，计划将父亲转去一家中医院，调理一段时间再回乡，我认为这样比较妥当，也比较放心。但父亲认为手术成功，自己身体已经无恙，执意出院，说回家后继续休养。考虑到有姐妹和外甥照顾，我虽然犹豫着，但也略略安心。于是，用车将父亲送至渡口附近，他们乘船十里，就到了金滩渡口。下船后，离家剩下很短的距离，是一段坡路。父亲不以为意，拒绝外甥抱他上坡，且因为出院，内心高兴，身体动作大了一点，刚一进家门就感觉不妙。

其时，我刚准备动身去合肥，得到消息，立即掉头回乡，却已经来不及了。我的父亲突发心梗过世，我未及见到他最后一面。第二天上午，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便匆忙赶往合肥，以便赶上次日上午在安徽省博物馆的画展开幕。父亲是八十三岁那年过世的，三年后，我的八十九岁的母亲，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母亲弥留之际，我家里所有的人都赶回去了。见到两个重孙辈，母亲非常高兴，但终是回天无力，母亲还是去了。为母亲办理丧事时，自发来了很多吊唁和帮忙的人。社会上常说用脚投票。这么多人的到来，就是对我母亲一生最好的评价。

为母亲送葬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的船把别人的船碰坏了。对方听说是汪观清的母亲办丧事，也没计较。二十五年后，我偶然听说那位大度的船民病重住院，便画了一幅画托乡友代赠，以表慰问，也是了却了我一直惦记的情。